

辽宋金元明清时期考古

董新林

2015年辽宋金元明清时期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学专刊、专著、考古发掘简报和论文约230部(篇),还有数部著名学者的文集或纪念文集,以及大型图录等,在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重要进展。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汇集了徐苹芳有关城市考古和历史,以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论文30篇,特别是关于元大都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系列论著和相关综合论述,践行了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学方法论的探索历程,将会对历史时期城市考古产生重要影响。上海博物馆编著《志丹苑:上海元代水闸遗址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中,介绍了12年志丹苑水闸遗址考古发现和发掘资料(7篇);阐述了水闸遗址学术价值与文化底蕴(4篇);探讨了水闸遗址整体结构和不同材质文物遗存的保护(2篇);还涉及运用多学科方法和技术手段,专题研究水闸遗址的相关课题(6篇)。《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首届“水下考古·宁波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一书刊发30篇文章,内容涵盖了中国和法国、韩国、越南等水下考古的回顾展望与发展态势、项目管理与技术创新、最新收获与研究成果等。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文集中,一些论文发表了辽金元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认识和新成果。

一 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城址考古一直都是历史时期考古的重镇。今年辽宋金元明清时期城址考古的亮点,是辽金时期都城和城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有较大进展。

(一) 都城

辽上京遗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组成,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上京考古队根据全面考古调查和钻探线索,通过对宫城墙和宫城西门遗址等的试掘或发掘(《考古》12期),探明了辽上京宫城墙的形制结构,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位置和形制规模(《中国文物报》2月4日),极大地推进了辽上京布局 and 沿革的研究。金上京遗址是由南、北二城组成,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是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永军、刘阳《大遗址保护视角下的金上京考古工作》(《北京文物》2期)一文指出,金上京考古队带着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对金上京遗址腰墙、北城西墙、南城北墙,以及南城南墙西门址等进行试掘或发掘,了解到城墙结构,确认城址始建于金代早期;搞清南城南墙西门由城门和瓮城组成,系金代中期前后

营建。填补了金上京考古的空白（《北方文物》2期）。

御街是南宋临安城的中轴线，是去太庙或景灵宫祭祀的唯一道路。御街两侧分布三省六部、太庙、五府和玉牒所等重要机构。杜正贤《回忆杭州南宋临安城御街考古》（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回顾他参与的御街考古发掘经过，并阐述御街考古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唐俊杰《杭州南宋临安城御街考辨》（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认为南宋御街全长5100米，号称十里禁街。御街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至鼓楼，为其南段，路宽15.3米以上；鼓楼沿中山中路至贯桥为中段，路宽11.6米；贯桥向西沿凤起路至武林路为西段，路宽3米~9米。南宋前期御街用香糕砖侧砌；最迟至嘉定年间，用石板铺路。御街两侧设排水暗沟，不设御廊。御街南段是大朝会之所；中段为商业中心。近年发掘的杭州市南宋临安城东城墙遗址位于保安水门和候潮门之间，始建于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宋代沿用。发掘者初步了解东城墙基础以及以上城墙的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内外城墙包砖之间距离约宽11.2米，合宋尺三丈有余（《杭州文博》1期）。

哈刺和林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都城。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刺和林苏木东。陈永志、萨仁毕力格《蒙古国哈刺和林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对哈刺和林自然环境、遗址发现和发掘收获、城市布局和历史沿革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指出哈刺和林城早在回鹘时期就已存在。孟凡人《元中都现阶段考古成果与元中都形制布局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细致梳理了有关元中都宫城、皇城、外城形制等考古发掘资料。在此基础上，探讨元中都与元上都、元大都的承袭关系和变化。认为元中都宫城规模、形状、主体殿址位置和性质似源于元安西王府城；元中都宫城具体配置的布局似仿元大都宫城；皇城形制似由元上都宫城外石夹城演变而来。刘未《蒙元创建城市的形制与规划》（《边疆考古研究》17辑）一文遴选18处所谓蒙元时期创建的城址和宫殿址进行其形制和规划的分析，探讨其城市类型、城市布局、城垣尺度和建筑尺度等，认为蒙元城市可以分为三重、双重和单重城垣3类。以“中”字形台基或方形台基为核心建筑可能是蒙古国时期的规划模式，“工”字形台基为核心建筑大约是至元年间元大都营建以后的制度。以台基式宫殿为城市中心、按整齐数值步尺确定建筑规模的城市规划方式是旧的宋金官式建筑传统与新的蒙元贵族政治环境相结合的特殊产物。

故宫博物院考古队对北京故宫内南三所、南大库、慈宁花园3处遗址的考古发掘，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清理出明清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是故宫首次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二）地方城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赵俊杰《关于宝马城性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3期）一文，根据2013年试掘资料 and 比较分析，认为此遗址具有规模小、城墙低矮、城内建筑和遗物等级高的特征，并结合文献记载，推定其很可能为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2014年，在宝马城遗址发掘了城内中轴线上偏北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编号JZ3）和环绕三座基址的回廊北段东侧部分。JZ3平面呈长方形，南向。夯土台基上有一座砖墙木结构建筑，面阔和进深均为3间，覆盆式明础石保存好，地面铺



砖。这是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塔虎城（又称“他虎城”或“塔呼城”等）是辽金史地和考古学界很关注的城址。位于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县。彭善国《前郭塔虎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对塔虎城考古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指出塔虎城繁荣于金代中晚期，不是辽代长春州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彭善国《前郭塔虎城的分期与年代——以 2000 年发掘资料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18 辑）一文对塔虎城发掘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将遗物分为 2 组，即二期。并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塔虎城金代始有城市建制，金代中晚期为其繁盛时期，元代沿用，明代废弃。[日]白石典之著，王达成译《蒙古国戈壁沙漠地区的契丹系文化遗存》（《草原文化》2 期）对蒙古国戈壁沙漠地区的带有契丹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是研究契丹辽代考古的新资料。

江苏扬州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地方城市。《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科学出版社）通过对扬州蜀岗古城址的城圈、城壕和城内部分遗存；蜀岗下城址的扬州城南门、唐宋城东门、宋大城北门和北水门等门址，以及唐罗城西南角城墙和马道基址等的发掘，探讨了蜀岗古代城址的范围、唐罗城的修建及其沿革、宋至明清时期的扬州城、蜀岗下城址的城门特点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扬州城的考古研究。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于 2014 年，又对推定为宝祐城东城门处（该处尚未拆迁）北侧进行试掘，了解到南宋时期夯土墙体至少有过三次修筑，与文献记载一致。还揭露出由木桩和柱洞组成的遗迹，平面呈“〕〔”形。其中间平行部分为南北方向，间距约 5.3 米、南北进深约 5.7 米，与东城墙相距 18 米。这是目前蜀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理出的第一座壕桥遗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 期）。汪勃、王小迎《扬州南宋堡城和宝祐城的发掘与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 期）一文对扬州南宋堡城和宝祐城相关图文资料和以往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了概述，认为扬州南宋二城沿革可分为堡寨（砦）城、宝祐城、“大城”三个阶段。

袁东山《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初步研究——兼论老鼓楼衙署遗址的保护活化与利用》（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一文，对明清巴县县衙和宋元寺庙平面布局、宋至清代重庆府衙谯楼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并就遗址保护和利用提出观点。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遗址发现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和明代各时期文化遗存。其中宋元遗存有道路、房址、水井、灰坑等。明代遗存有人工河道、建筑基础、道路和水井等。其中明代早期蜀王府宫城东南角用砖石砌筑的河道（G4）最为重要，是研究明蜀王府布局的重要资料。

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 1 号，考古人员发掘明清广州城西北角的北城墙遗址。此次确认了宋代广州城西北界，资料重要。宋代西城墙清理长度为 21.64 米，底宽 12.06 米、残高 3.15 米。由内（南）、外（北）壁包边砖墙和墙芯填土组成。砖面多有“番”字铭文，侧面有“番禺”戳印或“开七”刻划符号。明代城墙方向西偏北 6°。清理长 10 米、残高 4.05 米。北壁包砖墙厚 1.6 米。明代合广州三城为一，对宋代广州城西城北城墙略向北扩（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明清时期严州城位于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今之梅城，仍保留元末明初所筑严州城的格局。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调查，确认明清严州城，包括外城、内城，以及儒学、县治、坛庙等重要建置。除东北角因山势略弧形内凹外，城址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南北约

1200米、东西约1340米（《杭州文博》1期）。这是研究近古时期州城的重要资料。可惜文章没有发表城址测图。

始建于隋朝的即墨县衙是山东省目前唯一的三堂俱存的老县衙遗址。建筑群坐北朝南，按中轴线分布。2011年发掘出房址、路面、灰坑、水渠、过道、水井等，出土瓷器、陶器、石器、铁器等，是明清时期县镇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其中，一个灰坑可复原近300件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碗，时代从明万历时期延续到清康熙时期。

（三）村镇遗址

《白城永平辽金遗址2009~2010年度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报道了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永平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发现7座大型台基址、11座房址和台基之间的路面、排水设施等。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分为寺庙建筑群和村落建筑群，出土建筑构件、铁器、铜器、陶瓷器、玉石器等2000余件。遗址属于辽金时期。《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较为全面地报道了河北省黄骅市海丰镇遗址的发掘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金元时期海丰镇港口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金元时期海丰镇应与日本、韩国等有着海上贸易往来。在河南淅川县单岗遗址，清理出宋元时期灰坑、陶窑、墓葬、墙基、灰沟等，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大量青釉瓷器可能是豫西南地区最大窑口——邓窑产品。单岗遗址可能为一处兼有陶瓷器烧造功能的北宋晚期至金元时期的生活聚落遗址（《四川文物》2期）。

明代各地遍设卫所，徐州卫即是其中之一，卫镇抚司隶属其下。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匮乏。孙爱芹的《明代徐州卫卫镇抚司遗址考古发现与相关问题研究》（《东南文化》1期）介绍了在江苏省徐州市彭城广场发现的一处明代大型建筑基址。该建筑以五开间的宽大厅堂为中心，两边附有厢房，基址内还出土大量的军备物品。根据厅堂前部出土的碑志可知该组建筑为徐州卫卫镇抚司公署。该组建筑基址保存较为完好，结构较为完整，是研究卫所遗址的重要资料。

在黑龙江五常市拉林机场遗址，发现灰坑、灰沟、灶、井、路等遗迹，遗物以陶瓷器为大宗。根据“同治年制”款器底和清代铜钱等推断该遗址年代为清晚期（《北方文物》4期）。

（四）其他遗址

“四时捺钵”是辽代皇帝的重要活动之一。根据2013年对吉林省乾安县查干湖西南岸3处春捺钵遗址群进行的调查，发现篦点纹陶片和辽金时期陶瓷片，可以确认这3处遗址群应属辽金时期。3处遗址群共有近千个大小土台，均是人为堆积。3区都有小土台围绕大土台的现象。推测藏字区等级最高（《边疆考古研究》18辑）。此遗址为认识辽代春捺钵营地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宋时期江南运河入江口兴建、复修的澳闸系统，在宋代水运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研究古代复式船闸的典型案例。刘建国《两宋江南运河入江口澳闸系统研究》（《东南文化》3期）一文根据历史资料及考古发现指出，北宋与南宋对澳闸系统的建设各有侧重。北宋曾孝蕴的设计具有开创性；南宋史弥坚在继承中又有创新和发展。《镇江京口闸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介绍了京口闸遗址的考古成果。京口闸位于江苏镇江，是江南



大运河上的第一座闸，堪称漕运交通枢纽，历经唐代至清代，民国时期填埋为路。2011～2012年，考古揭示出唐代堰（闸）及北宋至明清京口闸东侧闸体、河道、码头、道路、碑亭等遗迹，出土唐代至民国时期陶瓷生活用品（其中有2件元代青花香炉）、祭祀供器等。

孙机《古代城防二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中对古城的夯土城墙、门楼、马面、瓮城等防御措施和攻城门的冲车和逾城用的云梯，以及地道等做了详细考述。有些认识尚需考古资料印证。

二 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

墓葬考古资料一直占据最大的比例。不仅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多，而且研究内容也较为丰富，其中不乏较为精彩的论述。本文从考古资料报道和综合研究两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发掘资料

将年度资料按辽金、两宋、元明清3组分述。

1. 辽金时期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文物出版社）报道的辽宁省凌源市城关镇八里堡村小喇嘛沟墓地是一处较为完整的辽代中晚期墓地，是研究辽代墓地布局的新资料。共发掘11座墓，均为东南向。除M6为砖筑类屋式墓外，其余均为土坑木构类屋式墓，叠涩券顶，墓顶用石板封盖，有斜坡式或阶梯式墓道。墓室平面多为八角形（仅M4为六角形）。其中M1位居墓地中心，未被盗掘。木构八角形主室内有一具画像石棺。出土金银器、白釉瓷器、三彩器和金属马具等。这是该墓地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墓。诸墓道内多随葬牛头、牛腿骨、马头。M7墓道内葬有整马。M6的东北部有2个殉马坑。此外，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大营子发现的一座砖室墓内，石棺壁面绘有彩画，保存不算太好（《文物》11期）。

在山西省大同市明代府城西南，曾发掘31座辽金墓葬。其中M1为砖筑圆形单室类屋式墓，骨灰罐在墓室中部。随葬陶瓷器18件。墓室内壁和墓顶绘有彩色壁画。此墓年代应属金代早期，而不是发掘者认为的辽代晚期。M6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南向。墓室内置一具石函，棺盖内壁刻有“大定四年（1164）正月……嫡母刘……”题记（《文物》12期）。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墓地东北约1千米处的一座壁画墓，为石筑类椁式墓，南向。椁室东壁绘备茶图和备酒图；南壁左侧绘2人，为侍奉图，右侧绘一假门，门两侧绘1男侍和1鸡（“金鸡老翁”），1女仆和1狗（“玉犬童女”），门上部绘“双头人”。西壁绘散乐图。北壁绘屏风前摆放长案、箱子、布袋、金铤等构成家居图（《文物》3期）。发掘者认为此墓应为辽代晚期至金代中期。笔者认为应该是金代早中期墓。2012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区化工厂发掘2座金代砖室墓。其中M18保存较好，为砖筑类屋式墓，南向，长方形单室壁面有砖雕门窗和雕花等。东壁两扇假门上，右扇刻“陕州县司李”，左扇刻“见男李庆二男祥，贞祐二年（1214）十月十五，孙百僧二孙瘦”。西壁假门上部有“李陕”二字（左至右）（《中原文物》4期）。山西省昔阳县松溪路发掘一座金代砖筑类屋式墓，由墓道、甬道、八角形主室和后耳室组成。此墓室结构完整，随葬品位置明确，为研究晋东地区金代丧葬习俗补充了新资料（《考古与文物》1期）。山西省繁峙县杏园乡南关村发现一座金代晚期至蒙元初期的砖雕壁画墓，圆形墓室内仿木构砖雕、

建筑彩绘，壁画保存较好（《考古与文物》1期）。

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阿来村发现3座土洞墓，均南向，一直排列。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均由竖穴式墓道、墓门和长方形墓室组成，室内有一木棺。M1随葬铁猪和铁牛各1；M2出土一块砖买地券，可知墓主人葬于金代明昌七年（1196）（《文博》2期）。在安徽省泗县长沟镇前李村清理墓葬48座，其中汉代42座，金代6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M9出土陶罐、陶瓶，“大观通宝”“正隆元宝”等，可定为金代墓葬。原报告定为北宋中晚期有误（《华夏考古》3期）。

2. 两宋时期

河南荥阳后真村墓地发现7座宋墓，其中3座砖筑类屋式墓，4座土洞墓。这可能是一处家族墓地，可惜未发表墓葬分布图（《中原文物》1期）。河南省温县苏王村墓地发现7座北宋时期砖筑仿木结构类屋式墓，出土遗物极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河南省新安县城关镇新安宋村北宋砖雕壁画墓是一座重要的墓葬资料。对墓葬进行重新测绘、详细记录和再研究，是一项新的尝试（《考古与文物》1期）。河南省洛阳市涧西七里河仿木构砖室墓也有新认识（《考古与文物》1期）。

在安徽省南陵县弋江镇奚滩村铁拐组清理M1和M2。推测原有封土，均为竖穴土坑木棺墓，灌浆封筑。M1南向，重棺，随葬品分层码放。内棺盖上有荒帷和旌铭，旌铭白字书写：“安康郡太□□氏之柩”。棺盖内顶贴女性人物画像。棺内尸骨和敛服、随葬品保存完好。M2为同穴合葬墓，被盗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文物出版社）报道了浙江省临安市横街村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洪起畏夫妇合葬墓。此墓坐东北朝西南。墓地纵长60米、宽52米。由抱手、封土、墓前建筑、两侧耳室、主墓室和暗排水道等组成。椭圆形封土位于墓葬中后部，高约5.8米。墓前建筑由通道、地坪与拜坛、排水沟（原称水渠）组成。在所谓拜坛和主墓室之间，有石块垒砌两个长方形庭院（分别放置两盒墓志）和2个砖砌耳室。主墓室为石筑类椁式墓，连体并列双室，券顶。墓门用条石封砌。左椁室木棺内有1个女性头骨。右椁室木棺内发现零星人骨，为洪起畏墓。洪起畏墓志涉及南宋末期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弥补历史之缺。浙江庆元南宋胡纮夫妇墓均为砖筑类椁式墓，残存部分莹园遗迹。胡纮墓（M1）被破坏，仅存墓志。M2椁室后壁砌壁龛。椁内有木棺。石盖和砖券顶之间为积炭。墓底有排水沟。出土金银器、铜器、水晶和瓷器等，还有石墓志（《文物》7期）。这是较为重要的纪年宋墓资料。此外，南宋墓还有江苏镇江五洲山墓（《文物》5期）、湖北襄阳檀溪村墓地（《文物》2期）。

四川和重庆地区的石筑类屋式墓多有浮雕画像是地方特色。重庆北碚区苦塘沟墓地，以南宋杨元甲夫妇墓（M4和M3）为代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M4椁室左壁龛内阴刻杨元甲墓志铭，方形后龛匾额阴刻“巴岳归隐”，内刻镇墓敕告文。M3随葬石墓志铭。椁室左壁龛内阴刻镇墓敕告文，两室右壁龛内均阴刻《楞严咒》。方形后龛匾额阴刻“大椿寿墓”，龛内曲足供案上放香炉和2盆插花（《四川文物》6期）。此外，还有四川资中鹤林村烂泥湾南宋墓地（《四川文物》2期）、重庆大足区龙神湾南宋王若夫妇墓等（《四川文物》4期）。

3. 元明清时期

内蒙古喀喇沁旗西沟墓是一座砖筑类屋式墓，由竖井式墓道、墓门、甬道和方形墓室



组成。墓室边长 2.35 米、高 2.15 米，叠涩顶。墓室被盗，残存人骨。清理 1 铜镜和 17 件泥质黑陶器。可定为元代墓（《草原文物》1 期）。河南宜阳仁厚村墓为一座土洞墓，南向。由竖井式墓道、甬道和靴形单墓室组成。墓室内残存 2 头骨等，为夫妇合葬墓。墓室内壁上绘孝悌人物故事图等（《文物》4 期）。发掘者认为此墓是北宋墓，笔者认为可能是蒙元时期墓葬。陕西省西安市南郊长安区“汉人世侯”刘黑马及其家族成员 12 座墓葬是蒙元时期考古重要发现。其中葬于元朝中统三年（1262）的刘黑马墓（M17）居于该家族墓地北部的祖墓位置，其余墓葬多分布其南面，分东西两片，略呈扇状分布。刘黑马墓为土洞墓，由长墓道、天井、过洞、主墓室、壁龛和后耳室组成，南向。出土灰褐色陶俑、泥质黑灰陶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玉饰件、铜钱、石墓志和镇墓石等（《考古与文物》4 期）。

今年发现的明清墓较多，北方多是平民家族墓地；南方多是贵富大墓。如北京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墓地，11 座明墓（M7~M17）均为土坑竖穴墓，分布密集，应以 M13 为祖茔。15 座清墓（M1~M6，M18~M26）也都是土坑竖穴墓，分属 3 组，其中一组以 M26 为祖茔（《北京文博文丛》1 期）。河南省温县苏王墓地有 89 座明墓，均南向。其中类屋式墓 1 座，类椁式墓 6 座，土洞墓 24 座，竖穴土坑墓 58 座。似可分成不同家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 期）。在河南省南阳市发掘的 11 座明代中晚期墓均出土青花瓷器，有的出土石墓志。其中土坑竖穴墓 3 座、砖筑类椁式墓 7 座（其中 4 座用白灰浇浆密封），砖石混筑类椁式墓 1 座。墓主人多为官宦子弟、军功人员和地方豪绅（《中原文物》2 期）。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阿来村清理的 3 座土洞墓，出土瓷器是明代陈炉窑常见器物（《文博》2 期）。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发掘的 11 座明墓，均南向，墓葬排列有一定规律，随葬品瓷器、木器和铜镜等，应为一处许姓的家族墓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 期）。此外，在北京市通州区土桥地铁站附近发现 12 座土坑竖穴明清墓（《北京文博文丛》3 期），在石景山京西商务中心发掘清墓 10 座（《北京文博文丛》3 期）。

福建省福州明代祝恒齐墓为砖筑类椁式墓，为连体并列 5 椁室，券顶，南向。墓底有排水沟。根据墓志铭可知，墓主人为明朝户部员外郎、名医祝恒齐（1457~1546）父子和妻妾合葬墓。其中西起第 3 室是为祝恒齐，第 4、5 室是其长子祝廷玉和儿媳陈氏墓。修墓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祝廷玉最后下葬于万历十一年（1583），历时 36 年。此墓两代人合葬一起，而且锡器家具保存好，是研究明代中晚期墓葬习俗的重要资料（《福建文博》1 期）。丘濬（1421~1491）曾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是明孝宗时期“理学名臣”。海南省海口市水头村丘濬墓园修建于明弘治八年，东距明琼州府城约 5 千米。墓园坐南朝北。丘濬墓位于墓园南侧。整个墓园布局尚不清楚（《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 期）。

四川省宜宾市明弘治四年（1491）周洪谟墓为石筑类屋式墓，西南向。茔园残存部分圈墓石，墓碑底座、墓碑残块和石供案等。墓碑残块存楷书“明赐进士榜”题字。周洪谟墓由墓门、前横室和双后室组成，墓底设排水沟。墓内壁有画像石图案，局部彩绘。后龛内浮雕仿木牌位。东室长方形牌位上楷书“明故太子少保周文安公之墓”，两侧刻凤鸟。西室后龛内牌位上无字。参考文献推定墓主为周洪谟（《四川文物》1 期）。重庆市铜梁县六赢村青龙嘴墓（2012TTQM1）为石筑三椁室类椁式墓，西南向。连体东西并列，石板封盖，平顶。此墓距张文锦家族墓地较近，不排除是张氏后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 期）。

福建省厦门市澳厝村清代苏养斋墓坐西朝东，残存茔园呈“风”字形，用“三合土”做围墙。墓前有石碑和石地表，有供桌。墓碑上阴刻楷书“皇清同邑庠生养斋苏公暨配高氏墓域”。苏养斋墓为砖圻石盖的类椁式墓，并列双室，平顶。周围用三合土夯筑密封。北椁室的木棺内有人骨残迹，出土随葬品 38 件（《福建文博》2 期）。

（二）综合研究

1. 综述

孙劭《北京辽金元考古回顾与展望》（《北京文博文丛》2 期）一文，从都城、陵墓、窑址、窖藏、佛塔及地宫等方面，对于北京地区辽金元考古资料进行概述。李永强《北京明代考古回顾与展望》（《北京文博文丛》2 期）一文认为，北京是明代考古研究的重镇，明北京城、十三陵和长城等构筑大半部明代考古史。北京明代考古大体分四个阶段。吴敬《略论我国古代墓葬的防护措施》（《四川文物》3 期）一文指出，从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有着各种墓葬防护措施，主要表现在尸体防腐、墓室防潮和墓葬防盗上。尸体防腐措施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材料和步骤上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墓室防潮和防盗措施都经历从帝王或高等级人物专享到宋元时期普遍运用于平民墓葬的发展过程。孙蕾、朱泓等《郑州地区汉唐宋墓葬人骨种系研究》（《华夏考古》3 期）一文，以荥阳薛村遗址和新郑多处遗址的汉唐宋墓葬人骨为研究对象，对郑州地区汉、唐、宋组居民的颅骨标本进行人骨种系的研究，并对汉唐宋中原汉民族的人种成分构成及其演变等问题进行推测和归纳。认为现代北方汉族体质特征最终形成的时间应不早于宋代。

2. 辽金时期

吴炎亮、万雄飞《辽代契丹贵族葬俗刍议》（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认为，辽代契丹贵族存在魂归深山，聚族而葬；使用金属面具和网络；注重厚葬和流行殉牲等葬俗。林栋《试论辽代墓葬的天井》（《北方文物》4 期）将辽墓天井分为竖井式（甲类）、庭院式（乙类）和漏斗式（丙类）三类。认为庭院式天井是契丹贵族的葬俗；而另两类天井主要是汉族的传统。辽圣宗开泰年间以后天井逐渐衰落。他还在《试论辽代契丹墓葬的棺尸床》（《北方民族考古》2 辑）一文中探讨辽墓木棺床、砖土棺床、石棺床的流行年代和源流。黄小钰撰写了《辽墓壁画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 期）一文。李鹏《辽代墓饰门神图初探》（《北方文物》4 期）一文认为辽墓的门神有神荼、郁垒二神，钟馗，武士门神，金刚力士门神等。这种源自农耕汉文化的门神习俗，逐渐为辽朝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群所广泛接纳。启门图是老生常谈的壁饰题材。丁雨《浅议宋金墓葬中的启门图》（《考古与文物》1 期）收集 99 个墓例，试图在分类统计和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语境、门、妇人、东汉启门等几个角度，进一步探索这一时期启门题材的相关问题。辽代的女真文化在我国境内发现较少。林秀贞《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玉佩精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介绍了墓中几件以龙、凤及鱼为主题的盒、瓶类玉饰，探讨辽代玉饰艺术风格及其对金代玉饰的影响。冯恩学《辽代的女真文化》（《边疆考古研究》18 辑）根据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 40 余个墓地资料，从封堆与洼坑、立柱遗迹、葬具、墓主的葬仪与葬式、随葬品等几方面对辽代女真考古的主要发现做了概述，方便了国内外学者对女真文化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



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位于吉林省舒兰市小城子乡东新开岭一带。墓地范围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宽约2000米。可分5个墓区。完颜希尹墓在第2墓区。顾聆博《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遗址研究新认识》（《边疆考古研究》18辑）一文，从墓区、墓葬和随葬品三个方面对墓地材料进行概述，并从墓穴和神道碑的位置、所谓“铁券”和墓室等级的探讨中，认为M1是完颜希尹墓。

蒋忠义、李春林《西夏陵形制与建筑特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简述西夏陵概况和帝陵名称年代；重点通过和唐宋陵比较，对西夏陵平面布局、建筑形式和技术特点等进行了归纳。认为佛规意识影响到皇陵的建筑形式。实心夯土建筑加精美的外装修是西夏陵突出的特点。

3. 两宋时期

吴敬《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对南方地区宋墓进行综合研究，试图建立不同小区域内的断代标尺，归纳墓葬特征，总结南方宋墓的葬俗共性及其成因等，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新认识。

宋代族葬之风盛行，家族墓地是家族丧葬理念及其礼制特点的集中体现。北宋时期相州韩氏有3处家族墓地，即丰安祖茔（今河南安阳殷都区皇甫屯西地）、新安韩琦父母等茔地（今河南安阳水冶镇西）和韩琦夫妇茔地（今河南安阳殷都区皇甫屯西地）。金连玉《试论北宋相州韩氏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与丧葬理念》（《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结合考古与文献材料，以新安茔地和韩琦夫妇墓所在的丰安新茔地为例，对其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及丧葬理念进行初步探讨。指出韩氏家族在北宋时期以“五音姓利说”规划墓地，集中埋葬家族成员，但墓葬位穴之间的尊卑关系又与文献所记载的五音墓地有所出入。南、北方地区的礼乐制度，自唐代以来一直存在一定差异。金连玉《南宋北方移民墓葬初探——以墓葬形制为中心》（《四川文物》2期）一文认为，南渡后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墓葬，与本地墓葬之间无明显差异，多数采用南方本地流行的墓葬形制埋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与北方移民的“权葬”思想有一定关系，可能也与南方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杨效俊《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的象征意义》（《文博》5期）一文认为，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虽然以墓主人为中心，但并不是简单地反映墓主的工作、信仰和娱乐生活。该墓壁画将宋辽时期业已成熟和完善的图像重新组合、绘制在墓室的相应空间，从而产生独特的建筑与图像程序和象征意义：寂灭为乐。此文较有新意。江苏溧阳宋代李彬夫妇墓是一座重要的宋墓资料。彭辉《江苏溧阳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俑像、墓志及葬俗特征研究》（《东南文化》3期）认为李彬墓是一座具有浓郁道教丧葬风俗特征的北宋墓葬，出土“十二辰”俑、“仰观伏听”俑、“天关地轴”俑、“廉路神”俑、“当圻当野”俑等器物，遵循《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规定。新刊布的墓志资料，揭示北宋时期溧阳李氏家族的谱系，较为重要。邓菲《试析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营建工艺——从洛阳关林庙宋墓谈起》（《考古与文物》1期）一文在砖雕工艺讨论的基础上，利用墓葬题记与考古资料，进一步探讨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营建以及工匠在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试图理解特定区域内墓葬图像呈现出的模式。两宋文人墓葬中成套出土书写用具，并形成“文房四士（友）”的搭配组合。扬之水《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考古与文物》1期）一文，结合文献对两宋墓葬出土文房诸物进行考证，指出宋代文房器具除笔墨纸砚之外，

还包括士人爱赏的各种雅物清玩。文房器用随葬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廖奔《北宋杂剧艺人肖像雕砖的发现》（《中原文物》4期）和康保成《新发现的四方北宋铭文杂剧砖雕考》（《中原文物》1期）都对2014年征集的4块汴京北宋杂剧艺人“丁都赛、薛子小”等肖像墓葬雕砖进行介绍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4件题名艺人肖像雕砖的真实性还须慎重认定。

四川省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中出土的一批瘞埋石刻，包括买地券、敕告文券、华盖宫文券、镇墓真文券等，是研究道教和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章红梅《〈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释录校补》（《考古与文物》3期）对已经发表的拓片和录文存在的疏漏做了校补，有利于学者再研究。

4. 元明清时期

董新林《北方地区蒙元墓葬初探》（《考古》9期）一文根据碑铭资料，结合丧葬习俗的不同特点等，将北方地区蒙元墓识别为蒙古族人墓葬、“蒙古族化”人的墓葬、色目人墓葬和汉人墓葬等四类。并对蒙古族人等的丧葬特征进行初步归纳，为认识无碑铭的蒙元墓提供参考。徐学琳《南方地区元代墓葬形制探析》（《南方文物》3期）将南方地区元墓分为八类和五个文化区。认为各文化区主要继承宋代以来的文化传统而各具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一致性的趋势，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相符合。此文墓葬形制划分标准不统一，略显烦琐和混乱。袁泉《继承与变革：山东地区元代墓葬区域与阶段特征考》（《考古与文物》1期）综合考虑地域文化、人群特点、地理形胜和政治冲击等因素，较好地建立起蒙元时期山东地区墓葬的整体时空框架。她认为，元代墓葬在当地宋金盛行的圆形单室砖雕壁画墓基础上，墓葬类型更趋多样化；同时一些小范围的局部区域特征日渐明显，如胶东半岛独具特色的石塔墓，以及济宁、嘉祥和邹县地区融南汇北的墓葬特点等。杨洁《陕西关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组合关系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4期）将关中地区蒙元墓葬随葬陶俑分为镇墓神煞、出行仪仗、随侍供奉和家畜动物俑4类。认为陕西关中地区形成了使用陶质俑群及明器随葬习俗；墓主人多为“汉人”，带有浓郁道教文化色彩。

董新林《明代墓葬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述论》（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对两京地区显贵墓、随葬品独特的墓葬、有壁饰墓葬、边疆“最高长官”墓、太监墓等进行了概述，并指出明墓考古学是研究薄弱、大有可为的领域。袁胜文《江西明墓的类型和分期》（《南方文物》3期）将江西明墓分为五个类型和三个时期。认为弘治晚期至嘉靖初期（中期）是江西明墓的变化期，其原因与经济状况、地理条件和丧葬观念等因素有关。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的年号。安葬明神宗朱翊钧及其皇后的陵寝——定陵是目前唯一正式发掘的古代皇陵。关于定陵考古资料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万历帝后独特葬式的关注很少。恩子健等《万历帝后葬式分析》（《北京文博文丛》1期）大胆推测万历帝后出现三种不同的“S”形侧卧式葬式可能与佛教有关，是借鉴“吉祥狮子卧”的佛祖卧姿做葬式，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江西星子县秀峰塔园发现三座类屋式墓，墓室彩绘壁画，坐北朝南。这在以类亭式墓为主的南方地区是较特殊的现象。徐长青、胡胜《江西星子县明代壁画墓的佛教文化特色》（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概述3座墓葬的基本情况，并探讨墓葬的佛教特色。认为塔园内3座墓葬墓顶呈覆钵状，墓室内绘有莲花图案，用须弥座棺床，还发现塔身、塔檐等石构件，可以判断这是明代开先寺的高僧墓，是重要考古



发现。

王岩《定陵出土文物与〈明史·舆服志〉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将考古资料和文献结合,介绍定陵出土的帝后服饰、冠、带、佩等,认为万历时期冕冠服基本上遵照明初定制,也兼有明中期的特点,又有新的突破。

韩伦《清代后妃陵墓格局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认为清代后妃陵墓分为皇后单独建陵,后、妃陵园合建,妃园寝单独营建三类。后妃埋葬位次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统治者丧葬理念的转变,即在吸纳儒家伦理纲常、尊卑有序观念的同时,兼顾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族而葬”的埋葬特性。并在位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清代“内、外双层茔区”兆域格局的概念。

三 手工业遗迹遗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陶瓷器和窑址

今年瓷窑等遗址的考古新资料不多,但都很重要。浙江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落。清代中叶以后停烧。《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文物出版社)报道了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发掘枫洞岩窑址的最新成果。主要有窑炉、大型房屋及其道路、水沟、储泥池、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民用、官用瓷器和制瓷工具等;瓷片达数十吨。通过发掘,揭示了龙泉窑陶瓷生产完整的工艺流程,确认一批明洪武至永乐年间的龙泉青瓷。并认识到枫洞岩窑址宫廷用瓷与景德镇珠山产品有共同的“样”;枫洞岩窑址不是官窑,其烧造宫廷用瓷是朝廷“制样须索”。2013~2014年发掘的繁昌窑柯家冲遗址和骆冲遗址是重要的考古发现。柯家冲遗址清理龙窑1座,作坊基址2处、路面1处、排水沟2条和工棚1处。窑内出土瓷器较为精美,供应上层社会。骆冲遗址清理龙窑1座、房址1座、路面1条。产品面向民众。骆冲一号龙窑是我国分室龙窑较早形式之一。骆冲窑址专烧青白瓷,创烧于五代,繁荣于北宋早期,是研究青白瓷起源的重要资料(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窑址是一处从北朝沿用到元代的磁州窑遗址,是滏阳河流域磁州窑的中心窑场之一。其中金代遗物最为精美,是研究磁州窑兴衰的重要资料(《文物》8期)。福建南靖县东溪窑是明清时期闽南地区一处较重要的外销瓷窑场。在封门坑窑址发现保存较好的窑炉、作坊、居住址和瓷土矿洞等(《福建文博》3期)。

在江苏南京雨花台区窑岗村发掘的琉璃窑遗址,清理出14座明代琉璃窑、窑作场地和护坡等遗迹,是重要发现之一。这批琉璃窑始烧于明朝洪武年间,废弃于明末。其中琉璃窑多由窑门、火膛、窑室和烟囱等构成。这些琉璃窑属于全倒焰式窑,代表了传统烧造技术的进步。窑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以板瓦、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为主,上施黄、绿、黑釉,造型精美;也出土瓷碗、陶模等器具(《文物》10期)。

陶瓷考古的研究论文较多,其中不乏较为重要的论述。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中国陶瓷考古的重镇,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后期的中心窑场。实际上在唐代元和八年(813)即有制瓷的文献记载,但考古一直没有发现早期瓷窑遗址。秦大树等《景德镇早期窑业的探索——兰田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期)一文,根据浮梁县兰田窑大金坞窑

址和万窑坞窑址发掘资料,对景德镇早期窑业提出新认识。第一,初步总结景德镇地区早期龙窑从长变短,坡度从缓到陡,建筑方式从凸筑到砖砌的变化趋势;第二,将景德镇地区9~10世纪的窑业分为5段,确定各段年代,即从晚唐后期(9世纪后半叶)至北宋早期(10世纪晚期),并总结各阶段的基本特征;第三,9~10世纪景德镇生产的青绿釉、青灰釉、白釉等三类釉色器物是同时生产的特色器物。此三类产品分别受到江西洪州窑、浙江越窑和北方地区白瓷生产技术的影响,也有少量长沙窑的工艺特征。江建新《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一文认为,元代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不仅吸收国内著名窑场的烧造技术,也汲取中东、韩国等优秀制瓷工艺;同时景德镇产品和技术也扩散到这些地区以及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全球化的开始。丁鹏勃《明代御窑窑炉及烧成工艺探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一文认为,明代景德镇御窑从明早期葫芦形窑演变为中晚期的馒头形窑。万历中期以后馒头窑从前窄后宽式变为前后等宽。并辨析火监横窑、色窑和风火窑等性质。

项坤鹏《宋代宫廷用瓷来源探析》(《考古与文物》1期)一文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认为宋代宫廷用瓷来源有土贡(道州府所贡)、朝贡(藩属国所贡)、赋税、宫廷须索(对宫廷的非正常供给)、臣下进贡等。从产品组织生产角度讲,有“置官监窑”和“官方科买或买民窑产品”两种方式。王小迎、王睿《江苏扬州南宋宝祐城西门外出土陶瓷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一文,对发掘区第3层出土陶瓷器的器形特征、装饰手法、釉、胎等进行类型学研究,揭示了宋代以来扬州城瓷器使用情况以及与周边窑口的关系。

刚岗《元代卵白釉瓷器的分类》(《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一文将元代卵白釉瓷器分为供奉瓷、官府共用瓷和商品瓷三类。袁胜文《南方地区唐宋制瓷馒头窑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一文将南方地区唐宋制瓷馒头窑分为四川盆地、广东和浙江杭州3区,历经唐早期、唐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指出北方馒头窑在南方地区兴盛与否与当地的瓷业基础强弱关系呈反比。

吉州窑是宋元时期重要的瓷窑。王睿《吉州窑之永和窑与临江窑初步比较》(《南方文物》2期)一文,对吉州窑中的两个重要遗址永和窑和临江窑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两个窑址属于两个类型。永和窑与北方诸窑关系密切,元代以后废弃;临江窑主要与南方诸窑有更多的传承,在明代临江窑仍在生产。罗辉《吉州窑绿釉瓷枕的装饰艺术探讨》(《南方文物》1期)一文,对吉州窑绿釉瓷枕进行了综述。指出瓷枕现存如意形和八角形两种器形,属于低温釉瓷,主要采用刻划花和印花装饰。王嫚《景德镇湖田窑与潮州笔架山窑青白瓷的比较研究》(《中原文物》1期)一文认为潮州笔架山窑青白瓷是在湖田窑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又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德化窑因集中在福建德化县而得名。唐末五代时期生产青釉瓷;宋元时期以白瓷和青白瓷为主要产品;明代以质优的“中国白”白瓷闻名欧洲。德化窑是我国重要的外销瓷产地。王睿《德化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对龙窑窑炉结构、各窑址瓷器比较、窑具与装烧工艺、烧成温度等进行详细分析。将德化窑分为6个窑群。其中宋元时期的盖德窑群以碗坪仑窑为代表;浔中窑群则以屈斗宫窑代表南宋至元代窑址;以甲杯山窑代表元明时期窑址。

彭善国、刘辉《东北、内蒙古出土的耀州窑青瓷——以墓葬材料为中心》(《考古与文物》1期)一文认为,出土耀州青瓷的辽墓,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且



时代绝大多数在 1020 年之前，墓主人多为契丹贵族。青瓷或是通过五代对契丹的贡奉或贸易流入辽境的。东北、内蒙古金代耀州青瓷只有 20 余件，散见墓葬、城址和窖藏内，变为民众日用品，流布地域比辽代有所扩大，这反映了金代各窑场产品竞争与流通格局的变化。崔剑锋、彭善国《塔虎城遗址出土部分瓷器的成分分析与产地推测》（《边疆考古研究》18 辑）一文对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县塔虎城出土的化妆白瓷和白釉黑花瓷器的成分和产地进行了测试和分析，认为化妆白瓷都是江官屯窑生产，而白釉黑花瓷器的产地来源不详。

（二）冶铁遗址

辽代冶铁遗址缺少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市延庆县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进行 4 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重要收获。遗址由矿山、冶炼、居住和作坊遗址构成。考古调查发现矿山 5 处，冶炼遗址 4 处，居住和作坊遗址 3 处。其中水泉沟生产链条较为齐备，在遗址群中居于核心地位。目前发现炼铁炉 10 座，其中水泉沟冶炼遗址有 5 座，发掘其中 4 座，保存较好。根据出土遗物和¹⁴C 测年，判定该遗址为辽代。水泉沟生活和作坊遗址位于炼铁炉遗址东北侧，相距约 100 米。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保存炼铁炉最多、炉体保存较好的辽代冶铁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解小敏《对北京地区辽代冶铁考古研究的思考——由延庆水泉沟辽代冶铁遗址说起》（《北京文博丛刊》1 期）一文梳理了辽代冶铁史和冶金考古研究现状，侧重介绍北京市延庆县水泉沟辽代冶铁遗址的新发现概况及其新认识，并对辽代冶铁考古提出自己的认识和展望。

（三）窖藏

1991 年，在南京市高淳区胥溪河的水利建设中发现一处元代窖藏，出土 30 余件具有南宋时代特征的金银铤、金饰件和少量典型的元代瓷器。金银铤皆有戳记铭文，铭文涉及成色、重量、地域、工匠名或金银铺号、用途等，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窖藏形成可能与元至正十二年（1352）或至正十五年（1355）当地发生战争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 期）。

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咸林中学校门前发现的一处南宋铜钱窖藏，形制为一椭圆形土坑。坑内铜钱用绳子相串零散摆放，被少量石、砖块覆盖。铜钱重量约 4 吨。其中有北宋时期 26 个年号钱、3 个非年号钱，南宋 2 个年号钱，金代 1 个年号钱，共 70 种钱币。此次发现的北宋钱年号之连续、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在陕西地区比较少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 期）。

四 宗教遗存考古发现与研究

这一阶段的宗教遗存几乎都属佛教方面。陈筱、孙华《中国石窟寺保护性建筑的设计与实践》（《四川文物》2 期）一文，对中国石窟寺所做保护性建筑的历史进行考察，认为在龛窟外部修建保护性建筑及设施是中国石窟寺保护的主要方式之一。从敦煌莫高窟加固工程、龙门奉先寺保护到云冈石窟保护性建筑的设计与实践，保护性建筑方案在与时俱进。理性科学、综合考虑的设计思路代表了石窟保护性建筑设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于博《从辽塔造像看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的影响》（《北方文物》3期）一文根据对辽塔七佛造像的个案解读，认为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体系影响巨大，辽代民众通过修行过去七佛所说的密宗陀罗尼经咒而祈福，可见辽代七佛信仰有着护世护法功能和现实功利性。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发现一块金代石刻，详细记述金代禅门曹洞宗著名僧人青州希辩的生平和影响，对于研究金代禅宗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宣立品《大金国燕京宛平县阳台山清水院长老和尚塔记》（《北京文博文丛》3期）一文，对这块长老和尚塔记做了录文和考述。

四川大足北山佛湾第137龕是一铺南宋绍兴时期所作阴刻线描画。该作依据《维摩诘经》而绘，完整地表现了文殊问疾维摩诘的情景。画面留有关于画工、刻工、主持人、功德主、制作年代等诸多题记，是研究晚期佛教美术不可多得的案例。米德昉《大足北山宋刻〈维摩诘经变〉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经变之内容、粉本、作者等问题加以考述。四川安岳县茗山寺石窟现存造像12龕，其中较完整的龕窟6座。还有碑刻12方、题记11则和石塔遗迹1处等。根据造像形式和风格等判断，主要窟龕的开凿时间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之间（《四川文物》3期）。四川南充白塔（即无量宝塔）是一座仿木构楼阁式方形砖塔，高约40米。王书林、徐新云《四川南充白塔建筑年代初探》（《四川文物》1期）一文，将南充白塔所反映的仿木构建筑形制特征，与该地区同期砖石塔进行对比，发现其不对称性和装饰性均较强。推测南充白塔建造年代为南宋中后期。

南京大报恩寺是明代皇家寺院，其前身为北宋重建的长干寺（后称“天禧寺”）。明代大报恩寺总体分南北两区。北区沿中轴线依次设置金刚殿（山门）、香水河桥、天王殿、大殿、琉璃塔、观音殿、法堂等，中轴线两侧设置御碑亭、经藏殿等。考古学者于2008年开始发掘琉璃塔基遗址和地宫。塔基平面呈八角形，由5层结构环绕，中心下面有地宫。圆形竖穴土圪状的地宫保存完好，清理出金、银、铜、铁、陶、瓷、玉、玛瑙、水晶、玻璃、丝绸、香料等236件（份）和大量铜钱。其中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文物》5期）等文字资料和“佛顶真骨”舍利、“感应舍利”和“诸圣舍利”，是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祁海宁、周保华《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时代、性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根据遗迹现象和出土《石函记》等遗物，认为大报恩寺塔基（TJ1）和地宫（DG1）建成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是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即天禧寺圣感塔）的塔基和地宫。YJ1是明永乐至宣德时期修大报恩寺琉璃塔而搭建的大型鹰架。H37可能是南朝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文物》5期）。祁海宁《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六号井的发掘及与“义井”关系的探讨》（《东南文化》4期）一文认为，大报恩寺遗址北区北侧的一座砖砌水井（编号J6），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建于北宋，上段为明代加建而成。J6的下段保存完整，砌造精良，规模在该遗址所有已发现宋井中最大。该井很可能为北宋高僧可政与名相李迪联手创建的“义井”。

四川高县半边寺摩崖造像现存造像4龕，其中3龕开凿于明代。这是一处佛道合一的造像群，是四川地区少见的龕形较大的明代摩崖造像。“三身佛”作为主尊是四川地区明代佛教艺术的典型题材（《四川文物》1期）。陈凤贵、姚军《四川马边县明王寺初探》（《四川文物》1期）一文，通过考古调查和勘察指出，明弘治十七年（1504）在四川马边县创建“牛王寺”，旋改为明王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改为“名望寺”。明王寺



现存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佛殿）、三清殿，佛殿与三清殿之间有灵池。明王寺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处重要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建筑群。

辽宁省辽阳县首山清代塔基遗址由石砌围墙、地坪、塔基和地宫组成，南向。石砌围墙平面呈近方形，东西边长 11.2 米、南北边 11.8 米，墙宽 0.6 米。塔基地坪部分呈“凸”字形，方形基础地坪铺砖，南部正中有砖铺踏道。正中为近方形塔基，用石块大石条围砌，东西宽 2.5 米、南北 2.7 米。石条内填断砖。地宫呈方形，边长 2.7 米，前面有斜坡通道。地宫内砖砌棺床上放置青花骨灰罐，粗瓷大碗、三足玉香炉、石砚等。据考证，该塔基遗址为清初清风寺天津禅师的舍利塔（《北方文物》4 期）。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蒙古国时期，道教盛行。陈晓敏《论元代北京地区道教的发展——从北京地区现存元代道教碑刻谈起》（《北京文博文丛》1 期）一文对在北京元大都发现的 12 通元代道教碑刻进行介绍。指出北京地区现存元代道教碑刻的碑文主要是反映全真教、玄教、大道教等内容，与史料记载一致。北京地区的道教在元朝达到发展高峰。

五 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

（一）土司考古的新资料

土司遗址考古近年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瞩目。2015 年“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孙华《中国土司遗址考古》（《南方考古》1 期）一文对中国西南土司遗产的背景、3 处提名世界遗址土司遗址概况和 5 篇关于播州杨氏土司遗产考古和保护研究的论文要点进行概述。他认为，泛称的“土司”制度至少可分两期：魏晋至两宋的“羁縻时期”；元至清的“土司时期”。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县唐崖城遗址和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涵盖了贵州高原边缘历史上有影响的土司遗存，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三处土司遗址既分别是永顺彭氏、唐崖覃氏和播州杨氏土司历史的实物记录，是中国西南地区土司治城遗址的典型代表，更是古代中国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文化交流的物质遗留，是中国古代从羁縻到土司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

继 2014 年湘西彭氏土司的司治所在——湖南永顺老司城考古发掘报告发表后，2015 年又有一组贵州播州土司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资料得以刊布，再次引爆有关学者的眼球。周必素、李飞《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1 期）从遗址和墓葬两个方面，对播州土司遗存进行全面梳理。指出播州杨氏土司不仅建有白锦堡和穆家川先后做司治的“平原衙署”，而且还在地势险要的山巅修建以海龙囤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完善的关围山城防御体系和田庄堰塘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海龙囤“新王宫”采用中轴线对称、大堂居中、前堂后室的布局，反映出中国传统官署建筑的特征。墓葬方面不仅有杨烈墓等 9 个土司墓，还有 3 座疑似土司墓，以及杨忠勇等贵族墓和罗氏家族墓地等。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不集中分布，分葬四处，但墓地有完整的规划。墓园内包括垣墙、园门、祭祀性建筑、墓碑、墓室和高大的封土堆等。有的墓室前方设有神道、祭台和石翁仲等。贵州遵义海龙囤城是播州杨氏土司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遗址。李飞等根据对海龙囤遗址城垣和 13 个关隘及门址的调查与清理发掘，将海龙囤城分为两大期。第一期城垣即为南宋末抗蒙山城——“龙岩新城”。第二期城垣即为明朝的土司城堡。并探讨了“龙岩新城”平面布局和明代城堡布局和沿革（《考

古》11期)。贵州遵义养马城是播州杨氏土司营建的山城，是海龙囤城的“羽翼”。简报介绍石城形状布局，认为此城兴废与海龙囤城基本一致，始建于南宋末，与宋蒙战争有关，废弃于明代万历末年（《考古》11期）。

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时代从南宋末到明代末，是西南土司遗存考古重大发现。墓地内确认（南宋晚期）杨价墓（M3）、（明初）杨铿墓（M2）和（明万历年间）杨烈墓（M1），均夫妻合葬，棺床底有腰坑。墓向均为坐西南朝东北（《考古》7期）。杨价墓为双室并列的木构类椁式墓，因未被盗掘，出土大量金银器等。杨价墓出土的器物 and 墓园建筑构件，为判断海龙囤一期城址及养马城的年代属于南宋提供了重要参考（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杨铿墓位于东南侧坡地前端，没发现墓园。杨铿墓为三室并列的石筑类椁式墓，朝东北向。南室和中室前方均各发现一个碑座垫石和一个石函，函内有一盒石墓志（《考古》11期）。遵义市团溪播州第25世土司杨辉墓茆园呈东南向，平面呈“凹”字形。茆园外疑有杨辉墓祠（现为雷音寺遗址）。杨辉墓居茆园中部偏东，夫妻妾的3人合葬墓，并列石筑类椁式墓，中室（杨辉墓）和西室的封门石外侧，各有一个石函，函内放置一盒石墓志，用十字铁条箍封。东室棺床下有坑，坑内有石函，函内有一石买地券。每个椁室后面各有一通石墓碑（《考古》11期）。

（二）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在国外考古发掘项目越来越多，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秦大树《探寻东非古国马林迪——北京大学肯尼亚陆上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介绍了发掘肯尼亚曼布鲁伊村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情况和主要成果。认为通过对马林迪王国两处的重要遗址的发掘，首次认定马林迪王国创始于9~10世纪，曼布鲁伊可能是早期马林迪王国聚集地。这是东非历史研究的重大推进。在10~11世纪，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载体的中国瓷器已抵达此地区。永乐通宝、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的御窑瓷片等，为郑和到访东非提供重要证据。《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一号墓园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报道了中蒙联合考古队于2006~2007年发掘蒙古国后杭爱省胡拉哈一号墓园的资料。共发现1座匈奴墓、6座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墓葬及17座蒙元时期墓葬，出土一批重要的文物。发掘者探讨了墓园布局和结构，并确认该墓园建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

姜波《从泉州到锡兰山——明代中国与斯里兰卡交往的考古学实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介绍了在斯里兰卡加勒港出土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用三种文字记述郑和代表大明皇帝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主神贡献布施的史实；同时介绍中国泉州发现的钦赐“世”姓的锡兰国后裔的祖茆与墓碑，揭示了锡兰国后裔留居东方大港泉州的历史。以此为基础，该文探讨了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族群、语言与宗教背景。伊斯兰玉石雕刻有着悠久的历史。许晓东《13~17世纪中国玉器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探讨中国玉器与伊斯兰玉雕艺术的关系。认为15世纪以来伊斯兰玉器艺术的发展，与蒙古人西征并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及其对汉地玉雕传统的接受和推崇息息相关。除了草原和海上丝路，西藏是明朝与中亚、南亚诸国交往的重要通道。马文宽《掐丝珐琅和眼镜制作技



术的传入》(载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认为欧洲及拜占庭的珐琅生产技术,在元顺帝时经伊斯兰世界传入中国,在明代进入繁荣时期,以景泰蓝为代表。经明清百年发展,景泰蓝成为中国传统工艺名品,远销海外。眼镜是明代早期经伊斯兰世界由海、陆两途传入中国,称为优速。明代中期始有眼镜之名。明末清初,我国才能自己制造眼镜。

六 古建筑考古

王进先《长治宋金元墓室建筑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书,将数十年宋金元时期仿木结构墓的考古资料和地面古代建筑有机结合,根据《营造法式》规制,对墓室内仿木结构的柱枋斗拱各部做法,以及墓室内砖雕、壁画等进行较全面的研讨。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

徐怡涛《〈营造法式〉大木作控制性尺度规律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一文,依据《营造法式》大木作等项制度,推算《营造法式》大木作的控制性尺度规律,并以现存唐至元朝古建筑实例加以验证。通过上述文献和实例的综合研究,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模数制和对尺度研究方法的若干认识和思考。万荣稷王庙位于山西省万荣县太赵村内。稷王庙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80米、东西宽约45米。院内中轴线从南起依次有戏台和大殿两座古建筑,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现代简易房。其中大殿是已知仅存的北宋时期庀殿顶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张梦遥、徐怡涛《宋至民国时期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格局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一文以稷王庙现状测绘、考古勘探及访谈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探求万荣稷王庙格局的历史演变历程,复原出稷王庙自宋、金、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各个重要阶段寺庙历史格局图。俞莉娜、徐怡涛《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大木结构用材与用尺制度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一文根据对山西万荣稷王庙的调查和精细测绘成果,整理出该庙大殿斗拱类构件、柱梁类构件及平面屋架尺度三类数据。运用统计学中对总体平均值的估算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了大殿各类大木作尺度数据的校正复原值。

勾栏瓦舍是宋元时期民间兴盛的演出娱乐场所。秦建明《勾栏瓦舍试解》(《文博》4期)从古代建筑结构入手,认为古代所谓的瓦舍,就是并联的卷棚建筑,以形似瓦垄,而名瓦舍。而勾栏则是栏杆的一种。栏柱外侧与底部横梁间有一斜撑,以形似勾矩,而名勾栏。因其是演出场地所用,故勾栏瓦舍,也就成为古代娱乐场所之代称。

北京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时称山川坛,历经修缮,主体建筑沿用至今。这是明清帝王举行农耕典礼、祭享先农等神灵的坛庙。其中太岁殿是最为重要、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太岁殿内中轴线从南到北由拜殿、太岁殿和东西厢房组成,有围墙。宋长忠《北京先农坛太岁殿建筑特色分析》(《北京文博》3期)一文指出,在太岁殿修缮过程中,通过对建筑风格和梁架的研究分析判定,太岁殿生体结构仍为明代原物。

朱海仁《广州古祠堂建筑初探》(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指出,广东汉族居民分三大民系,即广府民系(讲粤语)、潮汕

民系（讲潮汕话）和客家民系（讲客家话）。他根据文物普查资料，对明清时期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祠堂的布局、建筑特色进行了总结。

七 墓志、碑刻等

在河南省焦作市白作村北宋李从生墓中出土一方墓志。陈朝云、赵俊杰《北宋李从生墓志探微》（《中原文物》3期）一文指出，墓主李从生为北宋神宗年间籍贯泽州的平民。其子李吉于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为其建墓置志。元祐初年，李吉从泽州带领全家迁徙至怀州开采并经营煤矿，兴业旺族。此墓志对研究宋代焦作的煤炭开采及社会阶层等提供重要资料。降臣吕师孟是南宋晚期著名的“吕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向珊《方回撰〈吕师孟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指出，在江苏苏州出土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其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等，以及南宋驸马杨镇有关信息，可补史料之缺。墓志作者为宋元之际的著名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和《全元文》，是一篇重要的佚文。四川泸县宋墓以精美画像石而闻名。李伟、任江《四川泸县宋墓三通碑志石刻略考》（《四川文物》2期）一文，考证宋墓出土的古骥墓志、陈鼎墓志和张氏族谱碑。墓主人均为底层仕宦，墓志涉及了该阶层丧葬活动中遵从堪輿地镜法与理气派的习俗。其中张氏族谱反映了视先人墓葬为“庆堂”或“吉宅”以祈福的丧葬风尚。

辽宁省辽阳市出土的《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北方文物》3期）是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有关的重要资料。墓志较详细记载合葬于金天德二年（1150）的渤海遗民张行愿家族情况，其二子张浩曾任宰相，封南阳郡王，可补史料之缺。但该墓志后来遗失，《全辽文》等著录资料不完整。李智裕《〈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补释》一文根据辽阳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结合相关材料对张行愿墓志进行补释。

刘黑马是蒙元时期著名的汉军世侯之一，但《元史》以外的史料甚少。根据《西安南郊新出土〈刘黑马墓志〉考述》（《考古与文物》4期）一文可知，刘黑马墓志丰富了文献记载，可与《元史》勘证，对研究汉军世侯中的天成刘氏家族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根据李举刚《元刘天与墓志及相关问题探析》（《文博》2期）一文可知，在西安市长安区夏殿村之西采集到的《刘天与墓志》，是发现蒙元时期刘黑马家族墓地的重要线索。志主系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后裔。该墓志内容丰富，涉及刘天与的仕宦经历及家族婚姻等新资料。

陈玮《大蒙古国京兆总管府奏差提领经历段继荣墓志铭考释》（《北方文物》3期）一文考释了段继荣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经历。段继荣卒于蒙古国蒙哥汗二年（1252）。墓志撰写于蒙古国时期至元三年（1266）。段氏家族为金代关中世宦之家，婚姻圈涉及河中显贵李金吾、伪齐刘豫、辞赋状元吕子成。此墓志是研究金元之际陕西关中士人及大蒙古国京兆军帅田氏家族的重要资料，纠《元史》之谬。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樊波根据《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简要考证了刘整降蒙（1261）和泸州之战（1277）等历史，补充史料之不足（《四川文物》6期）。山西省临汾贾村元墓的墓主苏公式，为蒙古汗国时期平阳路（今临汾）的诸色人匠达鲁花赤，即临汾地区管理手工业的长官。他曾三次受命前往金帐汗国（主要为今南俄草原），向拔都汗缴纳赋税。沈颢根据



石墓志记载和历史文献，探讨了作为金帐汗国封地的平阳路；上缴赋税的内容以及从此地通往南俄草原的驿站道路（《考古与文物》4期）。

张智勇考证了北京丰台区出土的明代明威将军腾骧右卫指挥僉事徐通及夫人董氏墓志。徐通卒于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享年77岁。徐通为腾骧右卫指挥僉事，正四品；散阶为明威将军；夫人董氏被封为恭人（《北方文物》4期）。